

2402

六枝文史资料选辑

农林水专辑

(八)



六枝文史资料选辑

农林水专辑

第八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贵州省六枝特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一九九八年八月

**六枝文史资料选辑·农林水专辑
第八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贵州省六枝特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8年8月印刷 印数 1—1500

前 言

在我区进一步加强农业基础地位,深化农业体制改革,推进农业产业化步伐的重要时刻,《六枝文史资料选辑·农林水专辑》出版了。

我们出版《农林水专辑》,是遵照全国政协北戴河会议提出的文史工作要转向为经济建设服务,为现实服务的精神,结合我区是一个农业特区的实际,尝试用文史资料的形式,按照文史资料的“三亲”特色出版的第一部文史资料专辑。

《农林水专辑》,内容涉及农村工作、农业、林业、水利、电力、气象、农机等方面,稿件大多是反映农、林、水生产第一线的领导、技术人员的亲身经历,这些稿件,真实地再现了他们当年克服重重困难,为推动我区的农业科技进步,开拓工作新领域的艰辛历程。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种精神,一种勇于开拓,默默奉献,无私无畏,艰苦创业的情怀,对于今天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无疑会产生一定的启迪和鼓舞。

由于人力、条件所限,我们虽然尽了最大的努力,所征集到的稿件仍不够全面,这不能不说是件憾事,稿件中涉及的史实,也难免有错漏的地方,敬请知情的老同志批评指正。

《农林水专辑》编委会

1998年4月20日

目 录

前言

回忆郎岱县第一个互助合作重点乡——六七小乡

.....	付应祥 (1)
“大跃进”时期浮夸风拾零.....	罗克卫 (8)
首次毛口行.....	柯慧贤 (13)
忆六枝农业科学研究所.....	吴邦骥 (19)
往事琐忆.....	杨士昭 (26)
蹲点.....	李桂阳 (39)
回忆第一批湖南农技员在六枝试种双季稻.....	朱惠良 (43)
我的业务生涯片断.....	赵仁平 (47)
我到堕却农推站工作的简要回顾.....	聂忠义 (51)
回忆六枝特区第二次土壤普查.....	朱惠良 (55)
海南岛育种回忆.....	江锦恒 (60)
在海南育种.....	赵仁平 (63)
海南制种回忆.....	曹培秀 (69)
忆补雨杂交水稻制种.....	刘国基 (78)
我参加杂交包谷繁制、示范、推广的经过.....	张大明 (86)
小顶顶制种.....	龙尚国 (90)
我参加制种的经过.....	龙尚国 (97)

“元川 1 号”良种稻在纳窝推广的经过·····	王成久 (100)
六枝特区从点到面灭鼠工作的回忆 ·····	柯慧贤 (102)
良种安家记 ·····	李 桔 (110)
我所知道的坪桥畜牧场 ·····	安开华 (115)
忆六枝牲畜良种改良配种站 ·····	罗昌林 (119)
我参加承办中蜂改良示范场的回忆 ·····	龙元光 (124)
岩脚西瓜 ·····	郑国柱 (126)
科技兴农结硕果 ·····	付应林 (128)

花德河林场回顾 ·····	郭其华 (130)
回忆花德河林场的创建 ·····	马颜金 (140)
郎岱西拉果木场建场回忆 ·····	胡良萱 (151)
白腊林场的发展 ·····	郑国柱 (155)
岩脚镇羊场片林场概况 ·····	程 明 (157)
发展中的黑塘林场 ·····	邓志才 (159)
代家包造林记 ·····	唐 鸿 (165)
六枝特区“两杉”的引进和发展回顾 ·····	马颜金 (172)
我所了解的黑晒林场 ·····	杨正邦 (180)
木岗万杉林场大会战回顾 ·····	田庆云 (183)
我的选择 ·····	舒 宁 (186)
我的水果之路 ·····	龚洪文 (189)
老鸦山造林记 ·····	杨正邦 (191)
我承包大煤山林场的前前后后 ·····	张中严 (193)
绿色的养武之路 ·····	汪兴福 (199)

凉风洞电站前期工程琐忆	刘成学 (208)
湾河电站的创建经过	赵英恒 (223)
白岩脚水库扩建中的事故琐记	宋国锋 (226)
修夹岩电站小记	欧仕明 (228)
三修夹岩电站	邓志才 (230)
参加懒龙桥电站建设的回忆	帅学良 (237)
修建懒龙桥电站始末	龙尚国 (242)
修建懒龙桥电站点滴回忆	龙尚国 (244)
参加修懒龙桥电站见闻	龙尚国 (246)
中坝水库建设记事	宋国锋 (249)
我参加建设中寨人饮工程的经过	李 贵 (253)
凉风洞电站抢险纪实	李 贵 (256)
六枝气象局简史	陈钦尧 (258)
回忆两次成功的气象预报	陈钦尧 (562)
参加防雹队	龙尚国 (265)
防雹记	龙尚国 (268)
我所知道的六枝拖拉机站	蒋朝刚 (270)
后记.....	(273)

回忆郎岱县第一个互助合作 重点乡——六七小乡

付应祥

1952年8月2日，我在中共贵州省委党校学习结束后，回到郎岱县，随即分配到县委宣传部工作。当时宣传部部长是常宗惠，副部长是王洪昌，通讯干事是王慧斌，理论教员是黄协中，我任宣传干事，共5人组成。报到不久，即被抽调参加县委工作组，搞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试点乡。先任组员，后任组长。从1952年9月到1955年3月，近两年半时间，亲身经历了组织农业互助组、建立农业初级社的整个过程。现记述如下。

1952年下半年，郎岱县除了少数三类村需要继续改造之外，全县土地改革已经基本结束。当时广大贫雇农虽然分得了土地，但没有耕牛、农具、种子，发展生产仍然十分困难。地方各级领导对土地改革以后，如何深入开展农村工作也感到思路不明确。正在这个时候，党中央公布了《开展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决议》（以下简称《决议》）。中共贵州省委、安顺地委立即贯彻执行，分别发出红头文件，提出具体实施意见。《决议》指出，各级领导都要搞好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试点，用“点”上经验，指导“面”上工作。根据这些指示精神，郎岱县委决定组织工作组，以六七小乡作为试点。

何谓六七小乡？土改后，郎岱县行政区划作了大幅度调整，将全县十八个乡（镇）划为五十个小乡，安乐乡的第六、第七两个村合并为一个乡；第六村地处青菜塘坝子，第七村地处花德河沿岸，两个村不便冠以地名，故命名六七小乡。全乡面积：从东面的新寨到西面的羊角桥长约 12 公里；从南面的江家寨到北面的老虎冲长约 10 公里。全乡分 16 个自然村。第六村系第一批土改，第七村系第二批土改（全县土改分四批），两村群众基础好，已发展了党、团员，建立了党支部、团支部、妇代会、民兵连等组织，配备了三个乡干部——党支部书记兼乡长褚国安、副乡长韦应召、文书朱应文。第六村靠近县城，便于县委领导；第七村地处低热河谷地带，土地肥沃，水源充足，素有粮仓之称。

根据该乡具体情况，县委决定组建一个相应的工作组。所抽调的人员几乎涉及县机关所有部门。初入村时抽调的人员有县委宣传部的王洪昌和我，组织部的夏广山，县委秘书室（后改为办公室）的胡家骥，县团委的蒋天民，县妇联的夏治兰、徐光翠，公安局的任文清、陈大舜，法院的朱德民，农业局的龚敬盛，粮食局的邓光明、卢邦文，银行的朱祖文、邓克荣，供销社的陈甲寅、宋芳兰，共 17 人组成。后因工作需要或其他原因，有的人被调出，又先后调入黄协中、马家昌、国启勋、李志高、王化普、贾仁恕、宋鼎元等同志。1955 年春，我调回机关后，又调入罗克卫和谭伦同志。整个工作组成员除王化普、任文清、邓光明年龄稍大而外，其余都是 20 多岁的青年；又刚经过土改运动的洗礼，大多数同志思想好，干劲足，组织纪律性强，朝气蓬勃，作风过硬。

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前无古人。当时，称互助组是

社会主义萌芽。但如何开展运动？简直是“丈二烟杆，摸不到斗斗”。好在有中央《决议》作指导。工作组大多数同志经过土改，接近群众，发动群众较有办法，加上作风过硬，终于打开局面。入村后，我们一方面如饥似渴地学习《决议》和报纸转载的外地经验，特别是贵州省委在贵阳市白云区 and 安顺地委在安顺县华严乡的试点经验，另一方面分头深入农户，扎根串联，广交朋友，了解情况，做到心中有数。如每个自然村有多少农户，共多少人口，人强马壮的、有困难的、特别是需要救济的各有多少户；地主、富农有几户，是否守法；土改期间涌现出多少积极分子，姓甚名谁；有多少田地，每幅田地座落何处，水源、肥力如何；有多少耕牛，谁家牛大，谁家牛小，甚至谁家婆娘能干，又懂理，谁家婆娘最难缠；谁家的狗光叫唤，不咬人，谁家有“缩头狗”，要特别注意等等，这些情况都搞得一清二楚。因为掌握了实际情况，开大小会都能有的放矢，“壳壳斗米米”，没有空话、套话，所以群众最容易接受，从而对工作组倍感亲切，干群之间亲如家人。有了素材，文章就好做了。这一段，我们叫做“吃透两头”。紧接着以《决议》为依据，以宣传组织起来的优越性，揭小农经济的短。当时最流行的理论是：“小农经济是十字路口经济，如不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就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又要出现千家穷，一家富的局面，贫雇农又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反封建、土地改革将前功尽弃。”最生动的比喻是：“小农经济是三月桃花一时红，风吹雨打一场空。”联系真人真事进行讨论，最终把广大群众的思想统一了起来，激发了群众办互助组的积极性，群众纷纷要求加入互助组。接着就是具体实施、组织互助组。如果说宣传发动群众是软任务，真

正组织互助组就得下硬功夫。因为互助组要坚持“自愿、互利、民主管理”三大原则。每个组又要做到骨干搭配，强弱搭配，还要坚持“从少到多，从小到大，从低到高”的方针。强迫命令、急躁冒进不行，强扭的瓜不甜。但是强调自愿，放任自流，势必形成家门组、亲戚组、中农组，把有困难的贫农排斥在外。如果出现这种局面，就是吃“夹生饭”，达不到互助目的。因此必须做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使群众的觉悟同领导意图统一起来。我负责在江家寨搞所谓“点”中之“点”，先走一步。经过了解，该自然村有15户，其中，党员朱学文、村长周顺安、民兵王国忠、生产能手赵如富、周春庭等都是政治上或生产上的骨干。因此，我就向他们讲解天下农民是一家，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团结互助，共同发展生产的道理。在做通思想工作的基础上，由朱学文、周春庭各组织一个组把骨干和困难户合二为一，实现了骨干牵头、强弱搭配，团结互助的目的。

经过一个冬春的努力，全乡所有农户都组织起来了，无一单干。大的自然村组成三、四个组，小的自然村最少也能组成两个组，全乡共组成45个组。经过1953年“双抢”、“三秋”的考验，所有互助组都得到巩固提高，困难户的困难基本解决，少数懒汉、二流子也得到改造。地主、富农也全部参加互助组劳动，同工同酬，但不能当组员，不能参加群众会议。

1953年底，经过分析排队，以朱学文、陈永隆为代表的常年互助组，约占1/4。其特点是：有核心领导，能联系群众，有民主生活习惯，有技术分工，评工记分基本合理，常年固定；能响应国家号召，有少量副业（烧石灰等）和积累。其

余为临时性互助组。其特点是：有组长和骨干，有简单生产计划，评工记分不够合理，不管劳动力强弱、技术高低，都是工换工，农忙就干，农闲就散。全乡没有一个有名无实的空架子互助组。

1954年下半年，开始组建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社。仍然用“点”中之“点”的办法，由国启勋同志到花德河自然村，以陈永隆互助组为基础，吸收该村其他两个组参加，约50多户农户，办一个初级社。其过程是：首先宣传动员，发动群众报名入社；其次民主选举以陈永隆为主任的管理委员会，配备会计、出纳、保管等专职人员；其三民主讨论合作社章程，共同遵守；其四处理具体问题，土地除按人平均留出自留地外，各家土地全部入社，按产量的50%分红，耕牛、农具折价入社，合作社分三年负责还清价款，土地上的林木随地入社，成片的折价入社，成材后集体和原林木所有者按比例分成；其五建立生产组织，50多户人家生产不能搞鸭子翻田坎，老婆孩子一起上，因此，必须劳力分组，田地分片，社管会向各组实行定时间、定任务、定质量、定报酬、定奖惩、定检查等等。初级社就这样建立起来了。1955年春我调回机关，由国启勋同志任工作组长，继续抓好初级社巩固提高工作。

工作组不单纯搞互助合作试点，对其他突击性的任务，同样进行试点，搞出样板，然后县委再召开全县三级（县、区、乡）或四级（县、区、乡、村）干部大会，进行全面部署。如实行义务兵役制，粮食统购统销，组织群众入股办供销合作社、信用合作社等，我们都先搞出样板，供县委参考。1953年实行义务兵役制，县委要求我在三级干部会上介绍经验，我

把工作组的作法，各阶层、各种人的反映，最后收到的效果，逐项梳成辫子，用群众生动的语言整理成文，发言后，得到与会者的好评。

值得一提的是工作组的良好作风。全组从始至终都保持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作风，始终把人民群众视为主人，不管什么工作，都是反复交待政策，耐心细致地做思想工作，一旦群众掌握政策之后，就由群众当家作主，从不包办代替，更不强迫命令，因此干群关系，党群关系十分融洽。工作队员之间，除了寻开心，出洋相之外，没有个人成见，不闹无原则纠纷，更谈不上争名夺利。走后门这样的名词，根本闻所未闻。大家争办实事，两年多的时间没有一个人擅自离岗，请假的也很少。一年到头没有节假日，都是白天下地，晚上学习或开会。每人都有三件宝：手电、草鞋、木棍。因为每天下村一般都要晚上12点钟左右才能回来，没有草鞋不行，而没有木棍，进村后被群狗围攻时就难以招架了。

在生活上也是丰富多彩的。1952、1953年，还在实行供给制，伙食标准是高干吃小灶，县团级干部吃中灶，其他干部吃大灶。大灶的标准是：每天半斤大米，两角菜钱。工作组只有王洪昌（副县级）够中灶资格，其他都是大灶标准。我们自己动手，挑煤挑水煮饭都是轮流值日，当时物价又低，10多块钱买一头小肥猪，3、4块钱买一条狗，1块多钱买一只鸡，因此伙食搞得很好。杀鸡是常事，偶尔也杀狗、杀猪。有时还上山打野猪，因为当时何家寨、凝沟水、羊毛冲一带野猪不少。这一项任务王洪昌唱主角，因他是老八路，枪法好。我虽然枪法不算好，但积极性高，跑得快，又能爬山，勉强当配角。每次出动都能发现目标，可惜没有捕猎经验，野猪

打不到，只好弄几只斑鸠改善一下生活。我们也利用休息时间搞些娱乐活动，如比赛跳高、跳远；机关搞球赛我们也参加，但打完球当天就归队，一点不耽误工作。全体工作队员都是好样的。相对来说，陈甲寅、国启勋、马家昌、夏治兰等同志表现更突出，他们吃苦多，工作细致，群众关系最好。我因为搞“点”中之“点”，每项工作都要搞出个子午卯酉来，又负责向县委写简报，完成一项中心任务要写总结，每个星期要向县委作一次口头汇报，年终还要全面交待，因此得到深刻锻炼，受益不浅。

当年参加工作组的同志，有的已经作古，健在的都加入了“白发大军”。回忆当时的思想作风、工作作风、生活作风、组织纪律，实在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但愿后继有人。

“大跃进”时期浮夸风拾零

罗克卫

1957年10月，郎岱县委组成一个12人的工作组，进驻岩脚区阿岔乡，搞农村鸣放试点。我任组长，县委农工部长陈居卿带队，加上乡里6名领导，每个高、初级社都有人具体负责。白天晚上，召开一系列大大小小的干部会、群众会，鸣放、辩论、批判，斗争四类分子。紧张异常地搞了一个多月，竟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奇迹。原先沸沸扬扬的各种议论一下子风平浪静。在前段时间里到处泛滥的跳神闹鬼、赶会拜树，香烟缭绕、纸钱飞灰的怪诞活动突然销声匿迹，群众变得十分听话，指东决不向西。这种极不寻常的变化，使我叹服，也使我惊讶。

试点结束后，陈部长回县去了，工作组留下，转入正常工作。不久，工作组的组员们陆续接到通知回原单位，只剩我这个没有车马炮卒的老将守着空营。

1958年2月，乡党委书记刘绍文到区委开会回来，传达任务是大搞春季积肥群众运动。他和乡长李成周同我商定后，分工负责，经过艰苦深入的宣传发动，群众立即行动起来，满山遍野都是积肥人，进展快，效果好，6天中每亩耕地新增肥料87斤。我在欣慰之余，怀疑其中可能有虚数。谁知，区委第一次周末评比，别的乡新增亩肥已达3至4百斤，阿岔乡是倒数第一。刘书记从区里回来，立即召开紧急干部会，各

高、初级社队长以上领导人员都参加，要求全民投入积肥，坚决赶上去。我和乡的领导都成了“拼命三郎”。每人买了一个背箩，一个拐耙子，自己做了一个猪屎夹，带头上山拣粪，同时督促群众积肥。在实践中，拐耙子成了累赘，就放弃不用，只用猪屎夹。后来，凡是干粪，都用手拣起向后丢进背箩，便捷快当；遇到稀湿的才用竹夹。乡政府前院的粪堆迅速增高，群众积肥形势更为喜人，每亩新增肥料达到197斤，大家估计不会再背榜了。可是，区委第二次周评，阿岔乡不仅是要尾巴龙，而且差距拉得更大，有的乡已超过2千斤。我们不甘落后，又进一步发动群众割野草和嫩枝树叶，搞堆肥、沤肥。然而，这里才初见眉目，人家已跨过5千斤大关，有的还达到了8千斤。我疑惑不解，茫然不知所措。一天，乡长李成周和文书黄恭伦来找我，说：“我们弄清楚啦！人家的肥料是笔尖积出来的。上次评比，我们说要多报点，你硬不同意。再勒住马缰不放，我们的腰杆要着压断咯！”黄恭伦又说：“你装个不晓得就行。有过有错，我领就是。”我说：“戴着个落后帽子，我同样难受。但是，讲假话是不对的，是原则错误，不能搞。”两人投来怨苦的目光，快快而去。恰巧，第二天，通知我回县，使我从上下难做人的尴尬境地解脱出来，赶紧打起背包，当天下午就离开了。不久，县里召开农村工作大会，我在会上碰到阿岔乡党委书记刘绍文，他说：“各项工作都上去了。”阿弥陀佛！

县里的农村工作会是一次大跃进动员誓师会，气氛空前，高潮迭起。一位区委书记在大会上发言：“我们区今年要达到粮食亩产双千斤，力争打个滚。”气魄宏大，态度严肃，提法新颖，给人们留下了极深印象。可是，后来的发言人又

以更高的“计划”指标和更激动人心的战斗口号把它淹没了，并且使那位区委书记显得保守落后了。

同年8月，我奉派带领工作组到新场区黑塘乡，建立黑塘人民公社。在这个过程中，经历了相互穿插进行的群众运动浪潮。例如鸡毛夹火炭地推进农具机械化、半自动化、自动化运动，后期涌起一个巨浪，要求五天实现马车、鸡公车滚珠轴承化。黑塘公社大山纵横，重叠贯连，当时，有车无处用，怎么个“化”法？我心里干着急。一天，区里送来30套制造滚珠的工具和一包铁粒子。每套工具由一根长约15厘米，直径2厘米的钢条和一块10厘米见方、1厘米厚的钢板组成，钢条的一端和钢板的中部，有一个直径1.5厘米的半圆形凹坑，把铁粒放进坑里，用钢条罩住，再用铁锤砸钢条，使铁粒翻转挤压成圆形，就是滚珠了。当夜，工作组和公社领导干部召集了一批男劳力，分散在街边屋檐下，凑着玻璃灯干起来。开始时，叮叮砸击声密集悦耳，以后逐渐疏落，至凌晨4时，只剩下公社和工作组的同志。一夜苦拼，满手血泡，共制成滚珠150多颗。有人抓了在公社仅有的属于文书专用的玻璃板上试试，这些有棱有角的奇形怪状的东西只会跳，不会滚。我担心交不了差，幸亏上边后来没有过问，也没叫再搞。

1959年7月，县委书记给我一个紧急任务，说××公社的一个生产队每亩稻田追施优质肥1万斤，130亩稻田无一遗漏，要赶快总结，上报下发，普遍推广。我一天半步行130华里赶到公社，要求立马到生产队去。公社书记说那个队长走亲戚去了，晚上才回来；公社干部都下村了，无人带路。硬把我留住了一夜。次日上午9时，派一位社干带路，走了十